

# 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

---

陈大康 著

郭豫适审定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001号

**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

陈大康 著 郭豫适 审订

责任编辑：王娅丽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48000 印数：1—1000

ISBN7—5438—0464—6

I·46 定价：9.10元

# 序

郭豫适

## (一)

陈大康同志的《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一书将要问世，这部书稿是在他去年答辩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一番认真修改才完成的。笔者乐于向学术界读书界的同志们朋友们介绍这一部通过艰苦的劳动撰写完成的著作。

本书作者的主要意图，是想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一种宏观的研究，通过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从多方面探究我国古代通俗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研讨与此有关的一些规律，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力戒空言，有意避免在理论、观点上作空泛的发挥，而是花力气使自己的这项宏观研究建立在一系列较为切实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方面作出努力。本书是大康同志数年刻苦耕耘、潜心研究的成果。正如专家们所言，在近年来我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特别是在古代小说史方面的研究中，这是一部相当扎实的、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研究有所推进的学术著作。

这本专著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反映了作者这项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前者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进行了一番新的考察，研究的角度比较新颖，

并在所研究的范围内，对有关的现象和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后者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上避免单一化，在文学研究中引入了“量”的概念和方法，充分利用了数学统计方法，追求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从而增强了论述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现在分别就这两方面作一些评述，并就我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一些相关的问题，略述一些鄙见。

## (二)

从研究内容方面说，本书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进行了一番新的考察，通过多种视角对通俗小说史上的众多现象和问题提出不少新的认识和见解。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通俗小说是具有最广大的读者和最广泛的社会影响的读物，同时，其时间跨度之大，作品数量之多，是其他各类小说所不能相比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我国古代一般不受重视，只是到了晚清时期尤其是五四时期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古代小说这一份很丰富很重要的文学遗产，经过鲁迅等老一辈专家开创性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整理和研究，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成果。不过应当说，人们对它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大致说来，个体（单个的研究对象）的研究比较多，整体的研究比较少；分散的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较多，连贯的史的研究比较少；在史的研究中，一般的通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属于作家作品研究的串连和组合）比较多，深入的专题性质的史的研究比较少。中国古代小说包括通俗小说，都还有不少现象和问题至今还不清楚，等待学者们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求得切实的解决。

《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就是一种比较专门的史的研究项目，选择这个课题说明了作者具有理论探索的勇气和从事艰苦的思维劳动的毅力。难得的是，作者在进行大量的直接间接的史料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演进的历史轨迹进行描述时，能够对一些人们尚未充分研究的问题提供了自己的回答。

这里先要提到的是，本书作者对中国通俗小说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提出了“五种因素合力推动说”：“通俗小说在作者、书坊主、评论者、读者以及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这五者共同作用下发展。”

（本书绪论）首先是通俗小说的作者，没有作者就没有作品，作者对通俗小说的理解和认识，他们的创作热情、创作态度和创作水平直接决定了通俗小说本身的思想艺术质量。其次是书坊主。他们开设的书坊是通俗小说得以印刷和流通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书坊主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是否愿意刊行通俗小说或者喜欢刊行什么样的通俗小说，这对通俗小说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第三是评论家。他们对通俗小说的理论研究、作品评析及主张对通俗小说创作实践发挥导向性的影响。象明代万历后期的李贽、袁宏道、冯梦龙以及晚清时期的梁启超等人，他们对小说尤其是对通俗小说的积极鼓吹，对后来天启、崇祯年间和晚清时期通俗小说的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四是读者。他们对通俗小说的需求及所持的态度，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样的小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书坊主和作者对通俗小说采取何种抉择。一个时代人们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是通过评论家来反映的，不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好恶乃是决定通俗小说命运最强大、最深远力量。第五是统治阶级。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根据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自己的需要，对通俗小说采取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政策措施，曾经对中国通俗小说的繁荣或衰落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

本书作者寻出的直接影响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五项因素，如果分别地说，没有一个方面的因素不曾被过去的小说研究者所提出过或注意过，尽管有的因素人们注意较多，有的因素（如书坊和书坊主）人们注意较少；但是，把这五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作为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共同的作用力，以此来解释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以此来解释中国通俗小说几个不同发展阶段之所以呈现的是这一种状态而不是另一种状态，以此来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前进和后退、繁荣和衰落，以及通俗小说内部这一种流派、那一种流派的彼此消长等等，这却是这本专著具有创造性的一项研究工作。

作者一方面提出并在评述中分析了上述五种因素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注意到每一项因素自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统治阶级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总的说来是以他们的阶级利益为旨归的，但是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的具体态度，具体政策并非始终一贯，而是有所不同，有时甚至是相差很大的。明朝正德皇帝曾经半夜里派人去购买小说来看；万历皇帝也喜欢看《水浒传》；都察院等机构还积极地刊印通俗小说，上之所好，必及于社会，在朝廷官方对待小说采取宽容的甚至是实际上加以提倡的情况下，通俗小说的繁荣当然便有了一个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可是到了清初后期，尤其是雍正皇帝时期，清廷三番五次禁毁小说，护军参领郎坤因为在奏语中引用了诸葛亮、马谡的故事竟导致雍正帝龙颜大怒，郎坤最终遭到革职、枷号等严酷的惩处。试想，在一个写、印、卖、买、看通俗小说的人乃至不能严禁通俗小说的地方官员都有可能受到严厉惩罚的环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怎能不受到严重的影响和摧残呢？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是如此，作者、评论者、读者和书坊主这四方面，在不同

的时期，他们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待通俗小说的兴奋点也非始终一致。这五种不同因素自身的变化，这五种变化中的因素的相互制约和影响，它们之间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某种不同的组合及其所产生的合力作用，就构成了中国通俗小说数百年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由低潮而进入高潮，又由高潮转入低潮，以及种种不同的发展形态。

本书在论述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演变时，除了提及上述五种因素的互相制约和影响，还提及了社会的政局的重大变动，提及了明清之际鼎革时期的战乱对于上述五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文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所有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由整个社会的变化决定的，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通俗小说也不例外。”（绪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本书作者是自觉地根据这一指导原则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在文学研究中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有些文艺现象和问题，决不是“纯文艺”的、或脱离社会内容的所谓文艺“本体论”的观点和理论所能解释清楚的。其实，一个作家无法真正地做到遗世而独立，文艺创作本身并非世间之外的东西。文艺的社会性、时代性跟艺术的艺术性、形象性都是文艺自身的属性。离开艺术的艺术形象性就没有文艺本身；同样，离了时代社会内容，文艺自身又能留下什么东西呢？

本书是在中国通俗小说这一范围内进行宏观的研究，这就需要多方面地探求各种可能影响通俗小说发展的因素。本书作者认为直接影响通俗小说发展的有五个因素，他所设计的五种合力的研究模式，比较广阔地、比较全面地触及了通俗小说发展的多方面的原因。看来这个模式的设立对于完成本书的总题目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大康同志除了提出五种因素合力说，用以解释中国通俗小说

发展的动因以外，还对有关中国通俗小说其他一系列现象和问题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通俗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就进行相当细致的考察，并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新见。他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这一种文学样式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具体特点和特殊性，指出了通俗小说特别是长篇通俗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比其他文学样式更有赖于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作者一方面注意到它是精神产品，另一方面又充分地注意到它是文化商品。并且正是由于后者，才促使他更深入地充分地考察了作为书商的书坊主，以及作为这种文化商品的印刷基地和销售渠道的书坊对通俗小说的发展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对于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尚未进行深入仔细研究的问题，即那个被认为是“空白”之谜也进行了颇为具体的考察。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成熟的优秀巨著出现之后，为什么通俗小说并没有因为它的起点较高而发展得更为迅速，却反而出现了近二百年的停滞的局面？作者在本书中用了整个第二章的篇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他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发展过程之所以出现这将近两百年的“空白”，其责任并不在于作者，也不在于读者，而是由当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与文化的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决定的。并从中着重分析了三个重要原因，即印刷业落后的制约，封建统治者的高压控制，抑商政策所造成的伤害。应当说本书关于这个专题的分析研究是相当细致的，也是有较大说服力的。

此外，象第八章中有关明清时期一些人物事迹的考述，理出了从李贽评点《水浒传》到曹寅打算刊刻小说这一百余年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一条线索：李贽——袁宏道、袁中道——冯梦龙、凌濛初——袁于伶、杜濬、李渔——曹寅。在此基础上联系到曹雪芹



和他的《红楼梦》，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曹雪芹可被认为是这一文学脉系的最后一位继承人与集大成者。由于在接受这一文学传统影响方面比别的作家幸运，曹雪芹的《红楼梦》便能将几辈人的心血与创造熔于一炉，同时他又在这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也正因为如此，《红楼梦》才能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最伟大的作品。”这里就曹寅、曹雪芹祖孙二人对以往一些有关文学家及其文学传统的承传关系所作的勾勒，从文学渊源这一个侧面来阐述《红楼梦》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也都是富有启发性的有价值的见解。

### (三)

从研究方法这一方面说，本书也颇下过一番功夫，论文突出地引进了“量”的概念和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增强了论述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本书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可取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研究方法固定化、单一化、绝对化，而是从实际出发，对于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既注意从其他学科借鉴、吸取某些研究方法，也不是丢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味求“新”，“以新代旧”，所持的是一种辩证的求实的态度。

据我的体会，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当然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它又不是孤立的似乎是超思想、超内容的东西。本书中所采用的一些研究方法，例如作者自己所设计的“五种因素合力说”，就是方法和内容相结合的产物。从回答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动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来说，可以说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内容，从本书将它作为一种模

式，用以对中国通俗小说数百年演进的各个历史时期进行具体分析的工具和表述方式来说，却又是一种方法。

在科学研究中，结论是研究的结果；那么，研究的方法呢？这情况就有具体的不同。在某种情况下，研究方法可以是在研究工作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研究方法是在经过一个摸索阶段之后才确定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大康的“五种因素合力说”的研究模式是属于后者。读者们会很快地发现，本书开头就提出：推动通俗小说的发展的几个直接的五个方面的因素是作者、书坊主、评论者、读者和制订文化政策的统治者，随后的论述即依据这个模式一朝一代地展开。但实际的过程却是论文作者在收集大量资料，包括在福建有关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获取有关见闻之后，进行初步的分析归纳逐渐发现影响小说发展的种种因素，又接着梳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分析归纳，才确定五个突出的、重要的、直接的因素。至于将这个确定下来的模式运用于研究、描述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整个发展历程，其实已经是第二步的事了。这种情况用大康自己的话来说：“正如大家做过的几何难题，最后写出的证明清晰而严密，可是谁都知道，思路的获得与理清是许多次摸索与挫折换来的。”这是作者深有体会的自陈甘苦之谈。为了获得这个“五种因素合力”的模式，为了获得这个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即这个“思路”，他曾经耗费了心血，经过了一番并不轻松的艰苦思索。

我想，这本著作研究方法上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在文学研究中突出地引进了“量”的概念，是统计学方法的运用，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以及由此而获得的论述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的提高和增强。

在本书各章节中，读者很容易地觉察到，作者对一个论题的

展开或论证，往往都以足够的资料或数据作为论据，用统计的方法通过数量的显示来说明问题。何种小说流派何时处于兴盛时期？何时又处于衰弱的态势？作者常以自己设计的一些表格来使读者一目了然。为了分析拟话本的题材内容和结构特征，作者耐心地细致地进行了在一般人说来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分类统计的工作。有关才子佳人的三张表格，分别以“才子”、“佳人”、“小人”为本位虽然费去了作者不少的时间和本书一些篇幅，但它们的好处是使读者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有比较地浏览了一批才子佳人小说的主要人物、情节事件以及故事结局的概貌。为了说明明代嘉靖、万历那一个历史时期许多封建官员和知名人士与通俗小说均有关系，作者又列出了一张表，表上次序井然，措词简要，但却足足地列出了包括文征明、李开先、田汝成、郭勋、汪道昆、王世贞、袁宏道、袁中道、李贽、汤显祖、焦竑、朱之藩、邹元标、朱国禎、叶昼等在内共47人。看了这张表，谁能不首肯作者关于嘉靖、万历期间，上自朝廷权臣，下至地方官吏，连同当时那些誉满朝野的名士也大多与小说有关的说法，不认为明代那一个时期，自嘉靖皇帝以下，官员与名士读小说是一种颇为时髦的社会风气呢？

有位专家读过陈大康的论文，曾说作者“有数学家的头脑。文中不少论点都是依据大量的统计资料而提出的，有可靠的基础，因而是坚固的。”这是对作者在论文中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表示肯定。大康是有一点数学家的头脑，他在大学本科阶段就是读的数学专业。数学和文学似乎是不相关的两码事，但在本书作者身上却存在着相关的情况。大康在读大学数学系以前就酷爱中国古代小说，毕业后在一所学校里从事好几年的数学教学工作，可是他始终难以割舍对于古代小说的“恋情”，临近不惑之年，最后还是下决心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当我的研究生，攻读

博士学位，不改热爱祖国古代文学、献身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初衷。

应当说，学过数学给大康的文学研究带来了好处。我以为文学和数学虽是不同的学科，但作为科学研究来说，数学家那种严谨治学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也是从事他种科学研究的人所需要的。此外，作为数学家的科学家的思维方法以及诸如数理统计这些具体的数学方法和手段，对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者未始没有可供借鉴或采取的地方。事实证明，本书研究方法上的某些特点得益于作者曾经受过几年比较系统的数学训练。在我国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史学、哲学这些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中，传统上习惯于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很少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倘若能够在研究中适当地引进数量的概念和方法，使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有可能使研究工作增加一种活跃的因素，我以为对于丰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路，补充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是有积极意义的。

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研究进程的顺利与否、研究结果的圆满与否，无疑是关系十分密切的。在文学研究中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乃至引进国外的研究方法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这种引进必须恰当，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把国外引进的研究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人为地对立起来。前几年在文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一阵“新方法热”，有些文章热中于宣传“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等等新理论、新方法如何如何，实际上的研究却又往往挂不上钩，因为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文学艺术的研究毕竟难以一拍即合，结果只是流于搬弄一些其实连自己也未必弄明白的进口科技概念和名词术语，那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了。

跟许多坚持科学研究的严肃性的同志们一样，本书作者没有

去赶所谓新研究方法的时髦，片面地追求“弃旧从新”，而是实事求是地分别在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上采用适当的方法。在福建阳县书坊乡进行实地考察时，他根据幸得保存的《潭阳熊氏宗谱》的有关记载、熊氏宗祠门上匾额以及当地熊姓人家办喜事时大门上所贴的祖辈传下的对联等资料进行分析，意外地解决了有关著名的古代通俗小说家熊大木的名、字、号的问题，澄清了过去不确切的记述，所采用的就是传统的考证方法。

其实，不但某种研究方法对从事某种科学研究有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即便是找到了适合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缺乏认真的诚实的科学态度，缺乏对事物的艰苦的细致的研究，那也不能指望获得科学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是无需多说的。

#### (四)

《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有它的特点和优点，但也尚有一些不够成熟之处。由于论题较大、所涉问题较广，作者需要克服的困难就相当多，何况通俗小说史上不少现象和问题还有待于大家共同来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同时，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评论的着重点也不全一样，这就会对某些问题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见解，这是很自然的。

本书关于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的探讨，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存在着由改编到独创的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存在着改编型、过渡型、独创型三种形态的作品，这个基本看法人们一般是会同意的。本书第一章还就改编和独创的关系作了一般性的论述，指出改编和独创是两种不同的编创方式，但两者不是绝对对立的，就具体作品而言，改编类的作品中多少会含

有独创的成分，而最成熟的独创性的作品如《红楼梦》，其间也仍有改编的痕迹，“若将改编与独创视为两个端点，那么严格地说，没有一部作品能处于这个或那个端点之上，我们将要讨论的那些小说实际上都处于联系两个端点的中介过渡阶段之中，只是它们对改编或独创的隶属程度各不相同，因而处于不同的位置而已。”作者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的演变过程进行探讨无疑是有益的，上述有关改编和独创的一般理论分析以及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应持辩证的态度，不要形而上学地认为“凡是独创的小说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必然优于改编而成的作品”，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

问题的困难之处，主要是在于要判定某一个具体时期通俗小说在从改编到独创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何等地步，要判定某一个具体作品“对改编或独创的隶属程度”毕竟是很不容易的。拿《三国演义》来说，前人根据其史实与虚构的成分提出过“七实三虚”之说，本书作者把此书归入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初期改编型的作品是有道理的。不过由于学者、读者对《三国演义》的观感各有不同，关于它的虚实成分的比例或它的改编程度，究竟是三比七，还是二比八，抑或是四比六，各人的感觉和判断就会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比较通情达理的做法就是允许不同观感、不同看法的存在，不要去强求，其实也无法去强求一律。人们无法真地将《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小说来一个彻底的数学分析，因为它是一部文学创作，而不是您早晨从菜场上拎回家的一只菜篮，可以分别把里面的鱼和青菜拿出来秤一下它们是几斤几两，然后据此计算出二者的比例。

是的，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所有这些文学作品都不是一只菜篮子，它里面装的不是鱼肉和青菜，它“装”的是文学形象、

故事情节，是各种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的性格和命运，悲哀和欢乐，是作家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对于人生的思想认识和感情态度，作家及其作品所包含和反映出来的人物事件和思想观点，来自历史的和来自现实的这二者时常融为一体，难以分清。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学的方法就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这时研究者所面临的对象并不是可以用数量来显示的事物，而是无法用数量来显示的事物。这就讨论到科学研究中对科学研究方法究竟如何看待的问题，毫无疑问，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是重要的，但是科学研究方法决定论，在我看来至少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是可怀疑的。倘若有人想要获得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又想逃避艰苦的劳动，以为只要获得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就可以万事大吉，那不过是一种可笑的误会或天真的幻想。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包括文学研究界在内，这些年在学风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需要认真克服的缺点和问题，上述那种企图通过引进某种科学技术的新方法，无需通过艰苦劳动就可以轻松愉快地获得科学研究上的成功是一种表现。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学术界包括青年学术工作者在内，绝大多数人都是诚实的劳动者。他们不为时髦的浮夸风气所动，他们懂得飘浮的研究态度不可能获得扎实的研究成果，他们懂得在学术领域里急功近利不如潜心钻研，他们宁可迎着困难，脚踏实地、刻苦地进行耕耘。在笔者周围，在我国高等学校的科研单位中，都有不少这样的好同志，大康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正是这些被视为“笨伯”或“傻博士”的人一项又一项地向社会奉献出他们的有益的科学成果。笔者深深地感到，有这些同志在，有这些同志所体现的劳动精神、科学精神在，我国学术界大有希望。在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祝愿本书作者在科

研上扬长补短、再接再厉，和大家共同为祖国学术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同时也借此机会，向所有审读和帮助过陈大康写作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支持出版这部著作的专家们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一年四月

于上海



## 绪 论

对古代小说作系统的科学研究始于鲁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卓越的见识，勾勒了古代小说的发展概貌，并最先令人信服地证明，历代众多的作品并非是杂乱无章堆积成的集合，而是一个有规律的，由种种联系与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发展序列。这部对古代小说作宏观研究的开山巨著，至今仍指导着无数的后学。然而，先生对明清小说部分的论述却不甚满意，他在该书《后记》中不无遗憾地写道：

其第十六篇以下，草稿则久置案头，时有更定，然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况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借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觐，仅获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编录，亦复依据寡薄，时虑讹谬。惟更历岁月，或能小小妥帖耳。

资料的匮乏给著述严谨的先生造成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因为这势必影响到总体规律的发现与总结。在先生之后，也曾有人试图从宏观上描述古代小说的发展概貌，但更多的人则注重对各作品的搜寻与研究。作者生平、成书年代、本事源流、版本嬗变等无一不是考证的对象。湮没已久的作品一一被发掘，相关的资料经钩辑也日渐丰盈，而对作品的理解与分析，也远远地超过了那个时代的作者与读者。全靠着前辈学者辛勤耕耘的积累，近年来对明清小说的较全面的宏观研究才可能出现，而进行宏观研究也是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要求。